

7

隋唐運河新知

運河運輸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下至清代才見式微。隋代二帝為達成統一大業，開鑿五條運河，連接南北；唐代乃至之後的時代也是依賴著運河達到了政治和經濟文化的大一統，可說運河與朝代憂戚與共，對歷史發展影響深遠。

運河不只是一條河流，其沿線古蹟豐富，有橋樑、倉窖、民宅、古塔、城址等，這些都是文化的瑰寶。為配合主題，本文將抽取隋唐糧倉及柳孜（音：之）遺址，以文物角度敘述隋唐的運河歷史。

甚麼是隋唐運河？



隋運河分佈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運河是人工開鑿的河流。隋代興修的五條運河，沿用至唐，變動不大，故以「隋唐運河」概括之。

隋文帝時期建廣通渠與山陽瀆（音：壽）：

- 584年設廣通渠，連接大興至潼關。
- 587年設山陽瀆接通山陽至江都段；605年重修。
- 605年隋煬帝即位，立東都洛陽，建立其餘三條運河：
- 605年設通濟渠，洛陽至盱眙（音：虛兒）段。
- 608年設永濟渠，連接洛陽與涿州¹。
- 610年建江南運河，江都、餘杭²互通。

除廣通渠以外，其餘四條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相互銜接³。唐代基本沿用隋運河，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疏通，如四疏汴渠⁴、五浚山陽瀆⁵、三治江南運河等工程⁶。

隋代的運河有甚麼歷史意義？

中國的運河開鑿工程始於春秋，但這時所修的河道只屬地區性質，並未跨越全國⁷，直到隋代，運河工程才得以實現。隋運河全長5000里，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海河五大水系，將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等地緊密扣連起來，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將南方重要農業產區與中原政治中心和北方軍事重鎮連成一體⁸，應是當時世界最長的運河⁹。

¹ 今北京

² 今杭州

³ 任紫鈺：〈淺談隋唐大運河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中國文化遺產》，2016年05期，頁108-113

⁴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52-55，汴渠即隋通濟渠，該渠接通黃河，故有泥沙沉積，在唐有四次疏通工程

⁵ 同上註，頁55-58，唐初長江江面收窄，長江以南不能行船，故要修築

⁶ 同上註，頁58-63

⁷ 同上註，頁15

⁸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07期，頁46

⁹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頁15-16

隋運河體系開啟後世治河的傳統。唐開國以來投放不少資源疏通運河，促進經貿文化交流，累積財富，締造「開元盛世」。北宋都城汴京便是得益於隋唐運河，成為貿易之都，這可參考本教學資源冊（中二級）所載〈《清明上河圖》與宋代城市〉一文。明清時期開通京杭大運河，令運河網絡涵蓋的地區更廣泛。

建設運河工序複雜，不但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時間，還須要動用龐大的民力，所以修築運河也成為統治者集權和威信的象徵。那麼為甚麼歷代有開鑿和維護運河的傳統？運河又為統治帶來甚麼好處？下將探討。

為甚麼要開鑿運河？

漕運比起陸運的遞送量更大，方便長途運送如木材、糧食等的重物。不但如此，漕運也能縮短運輸時間，使君主能更有效地運用全國資源，比之陸路運輸更符合經濟效益。所以儘管開鑿及維護河體的支出甚高，統治者不計成本都要打通各地運河。

雖然楊堅得北周靜帝禪讓，在581年建隋，但是時天下尚未統一，仍有南陳等政權的存在。隋文帝在建國後三年下令開通運河，不難想像建構運河網絡最初的目的達致國家的大一統。以下將從政治及經濟文化層面，配合文物以作分析。

（一）建設運河有甚麼政治誘因？

政治的統一，既包括剛性的擴展國土、維護主權，又可指軟性的宣示權威和穩定資源供應、確保民生的政策。隋運河兼具上述作用，可謂隋代最重要的基建。

擴展國土、維護主權

上文提及，隋文帝最先建設的運河是廣通渠，這條運河連接首都大興至潼關，潼關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所以這項建設應是為了確保關中東部的安全，守護首都。

三年後隋文帝又下令開鑿山陽瀆，學者認為此次建造是預備伐陳，為運送兵糧物資，山陽瀆竣工之後，隋文帝便大舉出征¹⁰。

¹⁰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頁26

江南是陳朝的中心地帶，誠需收攏以穩定政局，所以又開通了其餘通往南面的運河。隋滅陳次年，江南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叛亂，隋軍平亂所用時間比滅陳還要長¹¹。因此，隋文帝令楊廣坐鎮江南達十年¹²，目的就是為了監察江南，防止叛亂勢力死灰復燃。

學者認為江南是隋代水上軍事要地，開鑿南方運河是一種準備¹³。江南地區河網交織，當地人擅長造船，一旦叛亂，水戰是其特長；若遇劣勢還可以避於孤島或海上¹⁴。比如開皇十年（590年），高智慧¹⁵叛亂，戰敗後就逃至海上。因此，要徹底消滅叛軍，必須出動水軍¹⁶。

「從平陳到楊素平亂，或從海道，或從山陽瀆入揚子津來到江南」¹⁷。建設江南運河是最直接掌管這片水域的方法，即使有叛亂，軍隊及物資都可以第一時間到達，在軍事上鞏固政權。

宣示權威

隋煬帝建設三條運河，且沿河建設奢華的行宮，方便自己南巡玩樂，可說是勞民傷財的反面措施，為後世所詬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運河的建設連接南北水陸網絡，隋煬帝認為「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¹⁸，指出統治者必須巡視國土，親自體察民情。南巡之事可反映他有統一國家的自覺——繼承傳統，借出遊宣示個人的權威，穩固統治地位，加強民間的向心力¹⁹。

穩定民生

同時，搭建水路也有助解決首都糧食供應的不足，從而穩定民生，達致社會安寧。隋都大興位於西安，關中平原群山拱衛，易守難攻確保政治的穩定。魏晉南北朝連年戰亂導致大量人口南遷，令人口急速上漲，誠需依賴其他地方運輸物資²⁰。因此，隋煬帝才會在即位之後立刻建立東都洛陽，便是為日後運河的工程鋪路。江南在中國有「糧倉」的美譽，其氣候相對暖和濕潤，長江也較黃河穩定，便於農業種植。在605年至610年間，隋煬帝一連開鑿的通濟渠、永濟渠和江南運河，這三條運河互通。運河體系由江南延伸開來，連接北方及關中，將南方的糧食送往各地，以解決糧食不足問題。

¹¹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年04期，頁15-27

¹² 同上註

¹³ 同上註

¹⁴ 同上註

¹⁵ 高智慧（？-590年），越州會稽人，隋朝初年江南地區叛軍首領。開皇十年（590年）起兵反叛，自立為帝。隋文帝楊堅派遣名將楊素、大將軍李景前往鎮壓。高智慧節節敗退，被斬首於泉州

¹⁶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頁15-27

¹⁷ 同上註

¹⁸ 《資治通鑑》，卷181，大業五年三月

¹⁹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頁15-27

²⁰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頁28

(二) 建設運河與確保糧食供應的關係

學者指出隋代兩位君主都在運河附近，尤其是洛陽修建大量的糧倉，積穀防饑²¹。近年考古挖掘得以證實運河是運送糧食的重要渠道。以下將以黎陽倉、回洛倉和含嘉倉為例，加以說明。

1. 黎陽倉遺址

黎陽倉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永濟渠沿線唯一的大型轉運糧倉²²。黎陽倉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長方形，東西寬260米、南北殘長300米，目前探明儲糧的倉窖有80餘座²³。

建倉時間及使用時間：隋文帝（583年），且沿用至初唐²⁴。

位置：河南省濬縣城東關大伾（音：披）山北麓，東鄰黃河故道，西距永濟渠約1.5公里²⁵。

歷史意義

倉城遺蹟出土了不少帶「官」字款板瓦²⁶，可見這是一個官倉，用於政府儲糧而非民間私自存取。其面積之大、且規劃良好，證明隋政府主動建倉，良好利用運河網絡有意識地儲存糧食。

2. 回洛倉遺址

建倉時間及使用時間：建於隋煬帝大業初年（605至606年間），一直使用至初唐²⁷。

位置：洛陽城北1200米²⁸。

考古發現的倉窖數量700座左右，是現時發現倉窖數量最多的古代

糧食倉儲遺址²⁹。倉城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140米、南北寬355米，且有寬3米的城牆。中部為管理區，東西為倉窖區，存儲糧食為黍³⁰。

3. 含嘉倉

建造時間：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唐代繼續擴建。

位置：洛陽城內

含嘉倉作為儲糧城要晚於回洛倉，但儲糧基地已經從洛陽城外轉移到城內³¹。「整座倉城佔地面積達43萬多平方米，共探明287座糧窖，四周有城牆和城門，內部十字形大街將倉城分為庫區、生活管理區和漕運碼頭區。同時也是唐代最大的官倉」³²。

歷史意義

含嘉倉出土的銘磚長32.5厘米，厚6.5厘米，可見的文字為：

「含嘉倉東門從南第二十三行從西第五窖，△△蘇州通天二年粗糙米白多一萬三△十五石△內右聖歷二年十一月八日納了」

上述的銘磚清晰交代了倉庫的名稱，也有明確時間指出糧食是在唐代武周時期收納。銘磚上刻錄著糧窖的位置、糧食品種、數量、來源地等，帶出該倉的糧食來源地分佈在大運河沿線³³。

糧倉的形制與保存

學者認為現時「發現倉窖的形制基本相同」³⁴：「均呈口大底小的圓缸形。在修建時一般先夯（音：坑）實窖的底、壁，並火燒烘乾，再用土和黑炭拌成的混合物塗抹做防潮層，鋪設木板和草再裝糧食。窖頂用木板搭架，再鋪以很厚的草蓆、塗上混合泥，搭建成一個類似房屋一樣的坡屋頂。這樣的封存方式可有效防止雨雪、潮濕對糧食的影響，儲糧時間一般可達10年以上」³⁵。

²¹ 曾謙：〈隋唐洛陽運河體系與漕糧運輸〉，《農業考古》，2013年01期指出：「洛陽的漕糧運輸從隋文帝開皇年間就已開始。隋文帝定都長安以後，鑑於『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新唐書》志第43，食貨3）的困境，決定從關東的河南、河北地區轉輸糧食至京。於是，隋開皇三年（583年）在黃河沿岸的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在衛州境內置黎陽倉。同時，與此相配套，還在渭河南岸修建一條全程三百餘里的廣通渠，以加強關中地區的糧食運輸。」

²²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頁48

²³ 同上註

²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8版

²⁵ 同上註

²⁶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頁48

²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8版

²⁸ 同上註

²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8版

³⁰ 同上註

³¹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頁46

³² 同上註

³³ 同上註，頁47

³⁴ 同上註，頁46

³⁵ 同上註

小結

糧食是國家發展的必需品，保持穩定的供應有助達致社會安寧，維護民生；反之，遇上災荒國家的糧食短缺，便需要大量向下徵納，百姓收成不足尚且未能應付生活，還要被迫上繳，容易產生反叛情緒，動搖政權。

是次抽取的三個倉城都是在運河附近，黎陽倉位於永濟渠，而回洛倉和含嘉倉都在運河網絡中心點——洛陽，可見隋代運河的建設方便了儲糧，在基礎上達致穩定的糧食供應，對維護民生和應付危機有重大作用。

不但如此，隋建設的糧倉到唐代仍持續使用，其存糧量之大、倉庫規劃之精細以及選址均見政府對儲糧一事十分重視。

另外，糧倉的庫儲也是透視隋唐社會的優質第一手史料，它們的存在告知後人——隋唐兩代的糧食類型。比如黎陽倉窖內近底部有為帶殼的粟、黍及豆殘存³⁶，而回洛倉藏黍（音：鼠）³⁷、含嘉倉則有白米的記錄³⁸，這些證據揭示了隋唐的飲食文化與生活模式。

總括而言，運河的建設是政治統一的必要措施，有軍事用途及民生用途，方便監視南方，兼具進攻與防守功能。

(三) 建設運河與經濟和文化關係

運河的建設不只為方便統治者監察與宣示權威，這也是國力的指標，屬於軟性宣傳，在經濟文化上促進南北大一統。運河遺址歷經時光的洗禮已經所存無幾，但近年考古挖掘有一重大發現——柳孜遺址，向我們還原隋唐運河之一的通濟渠到底運送甚麼物品。

甚麼是柳孜集遺址？

柳孜集（又名柳孜或柳孜村）位於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境內³⁹，是淮北隋唐大運河的遺址，被確定為1999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並在2014年申遺成功。學者認為「柳孜是隋、唐、宋三代，淮北大運河岸邊的一個重要集鎮，既是漕運中轉碼頭，又是較大的商品集散地」⁴⁰。

柳孜集有甚麼考古發現？

柳孜挖掘出眾多文化遺物、八艘唐沉船遺骸和碼頭遺址。該遺址出土大量生活用具，以瓷器所佔的比例達八成五⁴¹，專家鑑定這些器物的製作時代涵蓋了隋唐至元代，瓷器的來源為南北的著名窯口⁴²，涵蓋安徽、淮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河南、陝西、河北等地⁴³。瓷器中生活用具包括食具和寢具，以飲食器具中碗、盤、盞類易碎的消耗品最多⁴⁴。

除了陶器之外，還有挖掘的品種眾多，另有鐵器、銅錢、石器、骨器等文化遺物，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可歸納如下。

- 娛樂用具：陶球、陶鈴、骰子、瓷圍棋子、象棋子、石球、石錠⁴⁵
- 武器：鐵矛⁴⁶
- 俑：人俑及動物俑⁴⁷
- 飾品：骨簪、銅簪、木梳⁴⁸

不僅以上文物，另一枚刻有「緘滕」的殘石印章更是向人揭示沿河貨物具私人交易性質。該印章的印文鑿刻深度0.5厘米，印面4.9厘米，厚1.7厘米。該石的材質為廣東肇慶端溪紫石。印面為圓角方形，印邊較寬，印文部分殘破，但仍可辨認為「緘滕」二字⁴⁹。「緘滕」一詞在《辭源》有「封存」的意思，所以應是防止貨物私自拆封而印在封泥上的一種取信之物⁵⁰。

³⁹ 今泗永公路

⁴⁰ 楊忠文：《中國隋唐大運河·淮北新韻》（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頁103

⁴¹ 陳超：《安徽隋、唐、宋古運河遺址考古研究》，《中國港口》，2019年S1期，頁91-98

⁴² 同上註

⁴³ 同上註，指出瓷器的產地為安徽的壽州窯、蕭窯、繁昌窯；淮北烈山窯；浙江的越窯；江西的吉州窯、景德鎮窯，福建的建窯，湖南的長沙窯、岳州窯，河南的鞏縣窯、鈞窯、鶴壁窯、界莊窯，陝西的耀州窯、黃堡窯，河北的邢窯、定窯、磁州窯等

⁴⁴ 同上註

⁴⁵ 陳超、宮希成：《安徽柳孜隋唐運河遺址第二次考古發掘》，《大眾考古》，2014年03期，頁14-15

⁴⁶ 同上註

⁴⁷ 同上註

⁴⁸ 同上註

⁴⁹ 楊忠文：《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緘滕』石印》，《收藏界》，2010年05期，頁108

⁵⁰ 同上註

³⁶ 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河洛文明起源研究中心）：《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網址：<https://www.lykgy.com.cn/keyanchengguo/>，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6日

³⁷ 同上註

³⁸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07期，頁47

柳孜集出土的文物反映甚麼？

1. 柳孜出土的文物多樣化，基本為消耗品與消費品，當中以瓷器餐具佔量最多。瓷器的製作需經歷複雜的工序，加上又是易碎品，在這種情況下柳孜集仍挖掘出大量的瓷器，這便直接披露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優渥，肯定了隋運河的建設為唐代奠定物質基礎。
2. 挖掘的文物來源地遍及五湖四海，以南方最多。可見運河網絡促進了南北資源互通，交通往來便利，且有利於商業交流和文化融合。
3. 「緘滕」印章的發現或證明部分貨物並非官用，而是民用，即代表隋唐運河有很高的開放性，政府對商業發展持支持的態度。

總結

中國的運河古已有之，但隋朝是歷史上第一個建運河將南北連接起來的朝代。建設運河的目的是為了達致軍事、政治及經濟文化上的大一統，出土的文物證明了這些理念的實踐確具成效。

糧倉的發現主要論證了隋唐重視糧儲的政策，這也再次認證運河網絡有助於集合和囤積南方各地的糧食。柳孜遺址則披露隋唐時期經濟的強大及高度自由，也進一步說明了物產富庶的南方城市正不斷加強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從上可見，運河對隋唐政治及經濟影響確實不可忽視。遺憾的是，隋從建立到滅亡只經歷兩代，僅僅39年便亡國了，而花費甚巨的運河網絡，也是為唐的繁盛「作嫁衣裳」。